

# 追忆吴老往昔二三事 敬仰爱国奉献精神

郭双兴

(193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光阴似箭，岁月飞驰，吴征镒仙师驾鹤西去已满一载，我们缅怀这位老共产党员，著名植物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作为从事种子植物化石研究的晚辈学人，曾有多次向吴老学习的机会，亲身聆听他的教诲，并有缘参与他领衔主持的重大研究课题，感触良多，受益匪浅，现拙笔追忆所经历的往事二三，以怀念大师，聊表敬意。

1956年我自西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本科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报到后，立即到北京百万庄地质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向徐仁学习新生代孢粉，后改学古植物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百废待兴、大搞经济建设的年代，当时全国广泛开展地质普查，野外地质队采集的大量各门类化石标本，源源不断地送往地质研究所，新生代植物的化石就由我来承担鉴定任务。徐老收藏的有关古植物学的图书资料和地质部图书馆收藏的古植物学图书期刊也任意由我查找借阅。但是，仅据化石和图书、期刊上的图版进行对比，我仍不敢相信自己所鉴定的可靠性。徐老就推荐我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教授请教，胡老是中国首位研究种子植物化石的学者。胡老见我要研究新生代植物，很高兴地查看我带去的植物化石，耐心地告诉我说，鉴定被子植物化石是有难度的，因为被子植物的科、属及种类太多，必须要有雄厚的植物学知识，只要能同现代植物的叶片形态认真对比是可以正确鉴定的。他说，最初地质学家发现的植物化石就是植物学家根据现代植物对比进行确定的。经过胡老的指点，我有了坚定的信心，决心按照胡老指引的道路走。当时，有人还向我提起过一些植物学家的名字，如钱崇澍、秦仁昌、林镛和吴征镒等，但均憾无缘会面请教。

十年“文革”结束后，混乱的社会秩序逐渐走向正规，吴老得以从“牛棚”解脱出来，恢复原职，科学的春天迎面扑来。1978年10月，中国植物学会在中断十余年的学术活动后，首次在春城昆明召开学术会议。这次由吴老主办，当时虽有初秋凉意，但会议气氛仍是温暖融融，热闹非凡。这次会议，许多老一辈的植物学家都参会了，见面时大家兴高采烈，握手言欢；会上，发言踊跃，学术交流，讨论热烈；会下，叙述往事，低声耳语，共同祝愿永久平安。当时，我还是年轻之辈，在分组会上，简短地介绍了新生代植物的研究概况。会议结束前，中国植物学会首次成立古植物学专业委员会，徐老任分会首位主任，让我做副主任。会后，吴老听说我是研究种子植物化石的，高兴地说，自胡老研究山东中新世植物后，就没人继承他的工作了，你来延继研究是件好事；新生代植物是现存植物前辈，我们不仅要研究现存植物，还应该知道它们是如何发展演化来的，新生代植物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有人继续下去。

1980年5月，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我国首次召开的大型学术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知名的学者众多，涵盖地学和生物学两大领域，中国参会人数是最多的，大会和各分会的学术报告很多，讨论热烈；我将西藏发现的新生代植物作了学术报告。会议隆重举行，邓小平亲自出席闭幕式，并同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会议期间，吴老同我进行简短交谈，他





对我说，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研究种子植物化石，才能搞清楚中国现代植物的来源和演化。此后，吴老每次到南京来，江苏省植物学会都通知我，因为我是省植物学会的理事，我都欣喜地前往吴老的住地拜访请教，他都愉快地给我讲解研究种子植物化石的重要意义。

同吴老接触时间最长、聆听吴老的教诲最多，也是我收获最大的时间段，即是1990年吴老让我参加他组织和领导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课题“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参加此课题的研究人员有百余名植物学家，主要任务是将全国研究过的植物进行再整理和鉴定，对没有研究过的空白地区的植物都要进行采集、鉴定和研究，搞清楚每个科、属、种的分布地区和范围。本课题计划五年结束，由于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不得不延长时间，直到1996年5月才作结题报告。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每年年终都召开总课题和各分课题向基金委作年度总结汇报。在每次汇报会议上，吴老都对各个分课题指出明确分工和承担的任务，提出工作要求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回答各人提出的疑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各分课题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繁多庞杂，也还有许多问题尚不明了，有待研究解决。吴老总是喜笑颜开地给予耐心答疑和解释，并指出可能解决的途径。如此庞大烦琐的工作，如果没有对全国各地植物区系成分及其分布地区有清晰了解，如数家珍的熟悉，是无法做到的。

有一年年终总结汇报会是在湖南株洲中南林学院召开，刚达那里，吴老立即让祁承经老师带他到江西井冈山森林地区考察植物；返回后，不顾野外奔波劳累，晚上即向师生们做学术报告。吴老总是惜时如金，每时每刻都在抓紧时间，不知疲倦地奋力工作，毫不停留地扩充自己的知识，从无满足的时候，并时刻关怀年轻人的成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及时教诲他人。

有一次，吴老听到研究边远地区植物的汇报后，感到还有疏忽遗漏的地方，需要补充工作，汤彦承就对吴老说，别人承担的课题总是嫌任务太繁重，要求减轻工作量；可是，吴老您总是往自己身上增加重担，也不嫌累。这件事表明吴老组织领导的这项基金课题是全面调查和研究全国各地植物区系成分及其地理分布范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绝不能有任何疏忽草率。

在总结汇报会上，有个分课题组长提出经费不足，请求吴老追加经费。吴老便答应说，经费不够，就追加一些吧。实际上各分课题组的经费都是事先按任务分配好的，不是各课题组要多少经费就能给多少；当时吴德邻立即说，吴老总是菩萨心肠，有求必应，谁要钱就给谁。从这件小事上看，吴老对人总是宽宏大度、慈善为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这次会上，还有位年轻人写了一篇有意义的论文，请吴老审阅、修改并署名。吴老说，让我看看，提点意见可以，署名就算了；因为，你的文章我没有参与工作。这件事也充分表明吴老在学风上的高尚品德，没有参与工作的文章，就不署名，不占他人的成果。实际上，吴老领衔的这项百余名植物学家参加的课题，吴老对总课题、分课题和编写的文章都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和评论，吴老却从不署名。

1991年初，我出差路过昆明植物研究所，吴老留住我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和易门举行的云南省植物学会学术活动。吴老拉着我的手，让我同他和李锡文坐在同一辆轿车上，一路上吴老同李锡文讨论很多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领域的学术问题，同时，也向我询问和商讨一些有关古植物研究和打听地质界学界同仁的情况。我向吴老说，1959年斯行健同陈焕镛商定让我到他那里（即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学习现代植物知识，系统查看腊叶标本。同年5月我即到达那里，陈老告诉我，鉴定种子植物化石必须要熟悉现代植物，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地鉴定它们，更不能正确和系统地阐明它们的重要意义。于是，我就同该所职工一起出野外

采标本，观察植物的特征，并在标本馆查看、记录和描绘木本植物叶片形态近千张卡片。这些卡片就是我后来鉴定新生代种子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吴老微笑地说，研究新生代植物就是要这样做。吴老还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地势在早第三纪时是东高西低，那时的河流多数是注入印度洋和北冰洋，到晚第三纪青藏高原抬升才改变成西高东低了，河流也多注入太平洋。这表明吴老不仅对中国的植物区系研究有深厚的了解和功底，而且对地质、地理知识也很清晰明了。吴老是博学多才、造诣深广的院士，却毫无架子，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时间，不管是何人都同他们商量探讨知识，交流学问，真正体现教与学互相增长的境界。这种知识无穷尽、学习无尽头，诲人不厌倦、待人胸坦荡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虚心好学的勤劳品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植物学会活动期间通常都安排一天野外考察植物。当时，有人采到一株纤细的草本植物，问了几个人，都不认识，就跑到吴老面前请教，吴老立即脱口说出，这株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学名、形态特征及其分布的地区和范围。我当时很惊奇，因为，中国的现存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属种繁多，对随地采来的植物不假思索，即能信口说得如此详细，真是惊人记忆，令我万分敬佩。此事使我联想到1958年吴老陪同前苏联专家到我国热带雨林考察时，他沿途指着路旁的植物边走边向专家和陪同人员信口说出植物的拉丁学名，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了不起的好记性。在这次野外考察中，吴老还亲自拉住我的手，到一棵大树旁同我合影留念，我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我这无名之辈能同著名的植物学家留影，使我深感荣幸。

在很多场合，当人们褒奖吴老的功绩时，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承前启后罢了”，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实际上要能够继承前人的成果和业绩加以消化吸收，实践升华确非易事。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先辈为我们后人遗留下丰厚文化遗产，特别是在植物学方面的书籍众多，如中草药、农业和园艺花卉等书籍。要将前人的遗产去伪存真、汲取精华、融会贯通、精炼成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启迪后人也需要有丰硕的成果。吴老确实圆满地实现了他“承前启后”的愿望，他的功绩真可谓洋洋大观，著作不胜枚举，成就众人皆知，在中国植物学界享有盛名，无人能比。在国际植物学界也是很有威望的。吴老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辉煌业绩，也拥有启迪后人的累累硕果，足以让后人继承享用。

2003年，我有机会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做客座研究，这是我1990年参加吴老的重大课题时遗留的夙愿，因为西南地区，尤其是横断山区地形起伏多变，是植物多样性最丰富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我学习现代植物借以鉴定植物化石的理想地区，在这里我可学到众多的现代植物学及其分支学科知识，听取各类学者、专家和研究生们的学术报告，拓宽植物学知识和思路；还可容易地在标本馆查看腊叶标本，有利于对植物化石进行正确的鉴定，并对化石反映的信息做出合理的解析，据此恢复当时植物群落的外貌和特征，及其生长环境。最重要的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吴老在这里工作，我可以直接聆听吴老的教诲，愉快地享受他的治学精神鼓舞；还能亲自看到和听到吴老在学术报告会上，对植物学中的各类问题给予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意见、建议和评判，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2006年，吴老学术思想研讨会后，他写了篇书面发言，其中一句是“希望大家超越我”，这话是多么谦虚豪放、豁达开朗，表现出吴老的宽宏大胸怀和对知识渊博诠释。吴老清楚地认识到知识无边界，前进无止境，现代科技飞速前进，后学超先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吴老还写道：“希望参会者都能成为一个好学深思的学者，像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一样，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榜样，是一位不媚时、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不回避危险、刚正不阿的学者，让人钦佩。元





化先生有三深，即深读、深思、深写的风范，做学术的工作就是要寂寞、清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吴老的这些话是对王元化的信念，也是他所主张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和风格及人生的志向和价值。各人的才干和能力，千差万别，但是做人的道德品质和高尚风格不能丢，爱国家，爱人民的志向不能丢。为人要站得直、看得远、听得广、想得深、行得正、走得稳、言必信、行必果、心底慈、待人善、做事诚、工作严、抓得准、效果显。我们要不辜负吴老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诚恳嘱托，遵循吴老高尚道德情操，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和事业的慎独风格。

在同吴老的接触和交谈中，我亲自体验到吴老待人接物总是笑容满面，慈祥和蔼；对待事业总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他总是不断地给自己追加任务，勇挑重担，尽可能完整地完成任务，唯恐疏漏。我一直在想吴老为何如此地不辞劳苦，勤恳踏实，孜孜不倦地忘我奋斗，其动力和能量从何而来！这可能是近百余年来，中国备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和侵略，满怀雄心壮志，热血沸腾的吴老青年时代，看到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国时期依然是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中国仍然不是完整的统一国家。上世纪初，大批有识之士怀着救国安民的愿望，认识到只有科学技术发达，才能有国家的强盛，才能有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吴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怀揣赤诚的爱国之心，看透民国政府的腐朽不堪，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故此，他倾注毕生精力，将自己所有知识和才能全心全意地奉献给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所以，他对待任何事情总是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他的毕生精力都是为我国植物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着。他深知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质来源，假如，地球上没有植物存在，动物和人类都将消失殆尽。因此，在他的建议和领导下提出要摸清我国植物的家产，进行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全方位研究；在植物的应用上创建植物化学研究室；在野生植物的保护和遗传上，建立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和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造福子孙后代的合理建议，这些卓有成效的建议，都被国家接受、采纳和实施，这就是吴老给我们遗留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牢记、学习和实践吴老对国家赤胆忠诚、对人民慈祥和蔼、对工作严肃认真、对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们将吴老精神，永世传承下去。

追昔抚今，我们要传承吴老的夙愿，实践吴老事业的植物梦，追逐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努力做出自身的贡献，告慰在天的植物伊甸园先驱，安息的吴老和先贤师辈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慈祥和蔼、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植物学界的同仁决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热切期望。我们要自强不息，奋力前进，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步伐，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伟大祖国永不遭受外国列强的凌辱和侵袭，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

